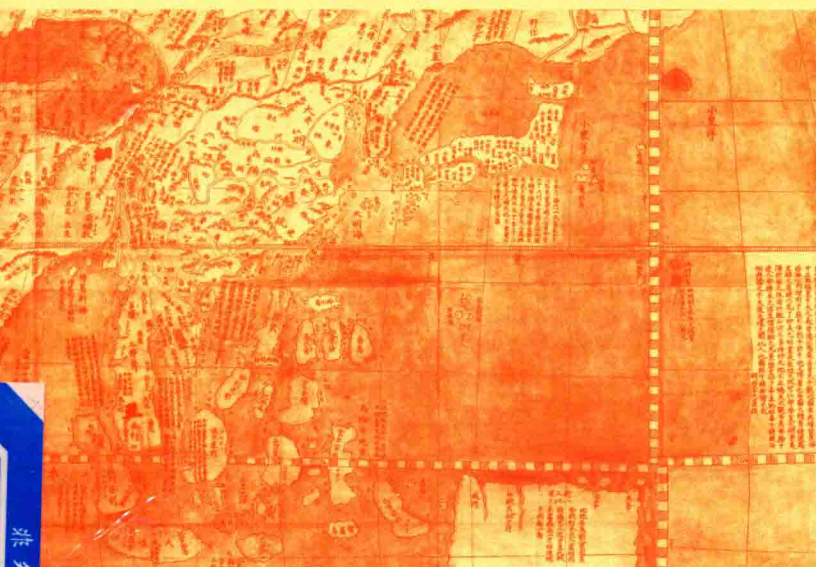


◎ 孙江 主编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2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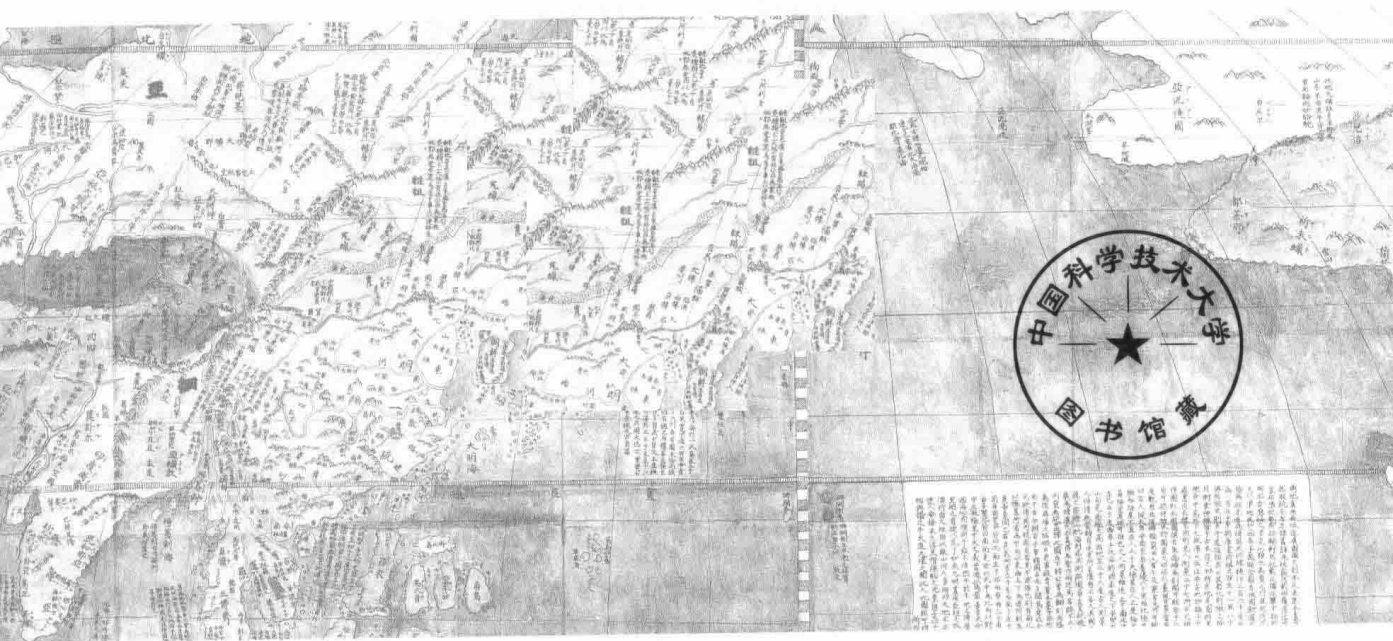


卷二

◎ 本卷主编
孙江 陈力卫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2卷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立于1897

2018年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2卷 / 孙江主编.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5965-4

I. ①亚… II. ①孙… III. ①亚洲—历史—研究—丛刊 IV. ①K30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7565 号

南京大学双一流经费和人文基金资助项目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2卷

孙江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965-4

2018年3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7 $\frac{1}{2}$

定价: 78.00元

《亚洲概念史研究》

主 办 方：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字母为序）

- | | |
|-----|-----------------|
| 阿梅龙 |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 |
| 陈力卫 | 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 |
| 陈蕴茜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
| 方维规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 冯 凯 | 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 |
| 韩东育 |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 胡传胜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学海》编辑部 |
| 黄东兰 |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 |
| 黄克武 |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 黄兴涛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
| 李 帆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
| 李恭忠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
| 李炯丘 | 韩国翰林大学科学院 |
| 李里峰 |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
| 李雪涛 |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 |
| 梁一模 | 韩国首尔大学自由研究学院 |
| 林少阳 | 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 |
| 刘建辉 | 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
| 闫小波 |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
| 潘光哲 |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 彭南生 |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 沈国威 | 日本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

石 斌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史易文 瑞典隆德大学中文系
孙 江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
王马克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
王晴佳 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
王月清 南京大学哲学系
王中忱 清华大学中文系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张凤阳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章 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朱庆葆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孙 江

编 辑：王 楠 于京东 石坤森

助理编辑：徐天娜 闵心蕙 王瀚浩 宋逸炜

开卷语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历经“语言学的转变”之后，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既有的现代知识体系受到质疑，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与此同时，一项名为“概念史”的研究领域异军突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概念史是反求诸己、推陈出新的必经之路。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Conceptual History)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历史哲学》，是指一种基于普遍观念来撰述历史的方式。20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涉语言、思想和历史的新学问。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概念由词语表出，但比词语含有更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表征出来后，该词语便成为概念。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

十年前，本刊部分同仁即已涉足概念史研究，试图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考察西方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以及汉字圈内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概念的互动关系，由此揭示东亚圈内现代性的异同。当初的设想是，从“影响20世纪东亚历史的100个关键概念”入手，梳理概念的生成历史以及由此建构的知识体系，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石。但是，阴差阳错，力小而任重，此一计划竟迟迟难以付诸实行。

十年后，缘起石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先后于2010年和2011年主办两次“东亚现代知识体系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国的学者围绕概念史的核心问题展开了热烈辩论。本刊编委急切地认识到，要想推进概念史研究，必须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努力。

本刊是通向概念史研究的一条小径，举凡讨论语言、翻译、概念、文本、分科、制度

以及现代性的论文及评论,皆在刊登之列。通过出版本刊,我们希望达到如下目标:首先梳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流变,继而在东亚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在全球史(Global History)视野下,从中国和东亚的视角与欧美学界进行理论对话。

本刊将本着追求学术、献身学术的宗旨,为推动撰写“影响 20 世纪中国及东亚历史的 100 个关键概念”做知识和人力准备,诚恳欢迎学界内外的朋友给予关心和支持。我们不敢自诩所刊之文篇篇珠玑,但脚踏实地、力戒虚言,将是本刊一以贯之的态度。

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言语飞逝,文字恒留)。

《亚洲概念史研究》编委会

目录

代序：概念史与社会史 孙 江(1)

类的概念

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及相关核心概念通考

——兼释“中国”与民族主义论争 方维规(7)

一、“民族”与 nation 考略 (8)

二、中国早期民族主义与相关核心概念 (17)

三、关于中国民族认同的论争 (39)

四、综论：nation 是意识构造与“心灵” (51)

布鲁门巴哈在东亚

——“人分五种说”在东亚的传布及文本比较 孙 江(60)

一、引言 (60)

二、来华西人与“人分五种说” (64)

三、“人分五种说”在日本的传布 (72)

四、“人分五种说”在清末民初的传布 (81)

五、人种概念：一个比较 (89)

群的世界

中国“社会”：一个扰人概念的历史 冯 凯(95)

一、引言	(95)
二、旧秩序的瓦解	(97)
三、理想化的“社群”:群	(105)
四、脱节的“社会”:社会	(115)
五、结论	(129)
“社会”概念翻译始末——明治日本的社会概念与社会想象	木村直惠(131)
一、“社会”概念	(131)
二、“社会”一词出现前	(133)
三、“社会”一词的生成——1875年,作为背景的公共领域	(141)
四、结语	(144)
黑格尔哲学在清末中国	张仲民(146)
一、引言	(146)
二、黑格尔在晚清中国	(149)
三、日本管道	(154)
四、作为工具的黑格尔哲学	(158)
五、章太炎与黑格尔	(164)
六、结语	(169)

新名词

“文明”与“社会”奠定的历史基调	
——略论晚清以降“新名词”的浮现对“中国历史”的重塑	章 清(175)
一、“新名词”之“入史”:“文明”与“教化”的视野	(176)
二、以“社会”为核心的“新名词”	(186)
三、围绕“新名词”的争辩	(195)
四、余论	(206)
从“新名词”到“关键词”:以“殖民地”为例	潘光哲(213)
一、前言	(213)
二、“殖民”与“殖民地”的初期使用:“新名词”的诞生	(215)
三、作为“规范词汇”的“殖民”与“殖民地”	(223)
四、从“瓜分”到“殖民地”	(225)
五、“帝国主义”与国族危机的想象	(229)
六、结语	(235)

数:帝国的算术和近代世界	车泰根(237)
一、数量化:19世纪后期中国的新的写作方式	(237)
二、作为帝国算术的统计	(240)
三、谁的数	(244)
四、作为帝国知识的统计知识和近代世界	(249)
近代各种“主义”的传播与《清议报》.....	陈力卫(252)
一、引子	(252)
二、“主义”在日本的对译	(253)
三、《清议报》对“主义”的吸收(1898—1901)	(254)
四、“帝国主义”的流行	(258)
五、“主义”的发展扩大	(260)
六、小结	(263)
征稿启事.....	(270)

代序：概念史与社会史

孙 江

拉康的同胞、符号学大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写过一本关于日本的小书,名为《符号帝国》^①。罗兰·巴特认为,在欧洲,精神世界试图赋予“符号”意义,而日本则“拒绝意义”,或令符号“缺失意义”。首都东京的中心“皇居”空空荡荡,这和欧洲城市中心挤满教堂、政府机关、广场、银行、剧院等截然不同,这种“空洞的中心”有一种脱离“意义”的解放感。在笔者看来,罗兰·巴特揭示的“日本文化”是欧洲这一先验的镜像所反照出来的真实/非真实的他者,忽视了意义“缺失”背后意义的存在,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对本真性的执着。话说回来,如果把“民国”看作一个符号,该符号又包含着或外加了怎样的意义呢?

民国即“中华民国”之略称,由孙中山发明。1904年8月31日,他在面对美国公众撰写的英文文章《中国问题的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一文中写道:“把过时的清朝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out-of-date Tartar Monarchy into “Republic of China”)^②。“中华民国”英文为 Republic of China,从文末“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与民主的战士”(We intend to model our new government after yours, and about all because you are the champion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可知,孙中山心目中的“中华民国”应该是以美国政体为原型的。但是,通读英文原文不难发现,孙中山的 republic 是以西欧民族-国家(nation-state)模式为张本的,内里夹杂着些许美国要素。

^① Roland Barthes, *L'Empire des signes*, Genève: Albert Skira, 1970.

^② Sun Yat-sen, “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 载《“国父”全集》第5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3年版,第111—121页。

稍后章炳麟的《中华民国解》(1907年)更将这种民族-国家模式推向极致^①。

republic的汉译名为“共和”，是经由日本“出口转内销”的。^②作为翻译词，19世纪中叶republic传入中国时曾有许多其他译名，如“合省国”“众政之国”“民主之国”等。在汉语语境中，republic和democracy的最大公约数是“民主之国”，承袭了西文原来的暧昧。^③梁启超译柴四郎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中有“厌王政而希民政”，“盖以共和而建民政”^④。民政即democracy。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英华字典》释democracy：“民政，众人管辖，百姓弄权。”^⑤因此，孙中山的“民国”一词含有democracy和republic两层意思。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第二版《上海方言英华字典》释republic：“民国，民主之国。”“民国”走进《英华字典》。

颠覆君主政体后成立的民国远不是孙中山、章炳麟所构想的民国，中国问题也远没有得到“真解决”。此后孙中山在言论上强调“民政”，要求实行“直接民权”，似乎在呼唤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主：“众人管辖，百姓弄权。”实际上无论在中华革命党时期，还是在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之后，孙中山都试图把政党作为“众人管辖”的归结点和载体。确实，在近代国家建设的要求下，共和也好，民主也罢，都表征着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均质化时代的开始，不可通约的复数的个体被纳入可通约的单数的国民装置之中。

那么，被通约的复数有何反应呢？1929年江苏省宿迁县发生了一起反对“庙产兴学”的事件，当时报章的主流叙事一直影响到今人的再表述，论者认为这是一起土豪恶僧煽动的反革命暴动。但是，如果从地方角度看，来自南京的官员所实行的变革不仅打破了固有的社会秩序，还扰乱了传统的精神秩序，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而县长对当事人“藤条桎梏，烛燎香烧，毒刑遍施”而建构的叙事，则使政治均质化完全丧失了正当性。^⑥

“小说家虚构故事，历史学家发现故事。”(海登·怀特语)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在其名著《档案中的虚构》中揭示了16世纪法国赦罪者的故事：“把一个恐怖行为转化为一个故事是隔离自我与事件的一种方法，最差可以达到自欺的目的，幸运

① 章炳麟：“中华民国解”，《民报》1907年第15号。

② 陈力卫：“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影响——以‘民主’与‘共和’为例”，《东亚观念史集刊》2011年第1期。

③ 方维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二十一世纪》2004年总第58期。最新研究参见李恭忠：“晚清的‘共和’表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

④ 东海散士：《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第1卷，《清议报》第1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日文原文：“我士民王政ヲ厭ヒ民政ヲ希ウテ”，“诸君见スヤ共和ヲ以テ民政ヲ建テ”。

⑤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英华字典》(1847)作“多人乱管，小民弄权”。详见陈力卫前引论文。

⑥ 孙江：“一九二九年宿迁小刀会暴动与极乐庵庙产纠纷案”，《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的话还能使自己得到饶恕。”^①1943年抗日根据地山西黎城县发生的离卦道事件则呈现出另一番光景：将自身行为与事件“隔离”开来，也是事件制造者常常采取的方式，因为至少可以达到瞒上之目的，幸运的话还能得到褒奖。事件过后，当地一位毕业于山西大学的知识分子说道：“今天所谓民主自由，在群众看来，较清朝时代的专制还不自由，因为在当时，只要完了粮（交田赋），便完全自由，任你抽大烟、赌博……一概无人管。今天出门还得开路条，动不动就开会，反而成了不自由。回想那时，真是在天堂上生活。”^②面对这种反共和反民主的历史叙事，套用罗兰·巴特的说法，对于民国符号不断变化的意义，在意义的彼岸存在拒绝意义的声音，这种声音可能很微弱，但并非不重要，它昭示出百姓不要说没有“弄权”的可能，连拒绝“弄权”的能力也没有。

如此说来，切入民国史至少有两条路径可循：一是着眼于文本的意义层面，二是关注社会情境层面。前者可谓之为概念史研究方法，后者则是社会史研究方法。

所谓概念史，就是研究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揭示该时代的基本特征。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为历史学辩护》中说过一句话：人们在改变风俗习惯的时候，没有改变语汇的习惯，这一事实常常使历史学者犯下错误，他们自认为是一个新词，而这个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了。^③我觉得，实际情形可能正好相反，更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历史性的语言和概念，其实早已当下化了。傅斯年反对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他曾说道：“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④此话十分中肯。对于诸如 republic/共和之类的概念，首先需要关注语词翻译问题^⑤，这里所说的语词不是单一的，涉及民主等相关词语；接着是语言被赋予特定的社会、政治内涵而成为概念之问题；最后是概念在一定时空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异之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梳理，否则，所谓 republic 研究不过是脱离文本意义的能指游戏。目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概念史研究，以至出现将概念史与“观念史”混同的现象，其实二者根本不同。无论是以人物言论为主线的思想史，还是“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下的观念史，都是脱离“历史”的思想和观念。在观念史研究中，即使个别观念能反映历史事象，但观念自身基本上是不变的常数，而概念史中

① Natalie Zemon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14.

② 孙江：“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

③ 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Paris: A. Colin, 1993.

④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载《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⑤ 无需多说，对于 republic 的词源及其在西方语言中的变化也需加以考虑。

的概念是可变的、复数的，是注入了社会和政治内涵的词语^①。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在中国重新起步，迄今果实累累，负荷亦沉，不少在社会史名义下的研究其实是反社会史的。10年前，我们提倡进行“新社会史”研究，乃是有感于社会史研究过于拘泥于“结构”。“年鉴学派”第四代代表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多谈“文化”而少言“社会”，就是要回避这种结构性的历史叙述。回顾社会史从诞生到今日的历史，我觉得贯彻始终的是批判和自省精神。社会史首先是作为批判的武器出现的，无论早期强调社会经济史研究而划定与政治史的自我界线，还是当代针对“语言学的转变”，拆除自我限定的藩篱而摆脱社会科学理论的纠缠，都包含着对主流叙事的批判和自我反省。何以“年鉴学派”钟情于中世纪晚期，乐此不疲地出版了那么多历史著作？其秘密在于质疑“近代”的唯一性和绝对性。何以“年鉴学派”关心心态史和记忆问题？其宗旨在于阅读被“近代”这个差异装置所压抑的沉默的声音。相对于君主制，共和包含着不可解构的正义价值，但是，作为法律和秩序的共和却是可以解构的，因为任何法律和秩序都蕴含了暴力。于是，在共和的主旋律中，人们可以听到宿迁和黎城事件所传达的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另一种声音。

接续清朝而出现的“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变局的产物，涉及的问题之繁多，积淀的史料之庞杂，是以往历朝历代所无可比拟的。非法非非法。说到底，概念史和社会史不过是帮助我们接近不在场而具有实在性的过去之方法，如何阅读文本才是历史研究的根本，这种工作不仅要读出文本中写了什么和没有写什么，还要考察文本作者基于何种动机这样说而不那样说。不加甄别地网罗资料而加以排列组合的朴素的实证主义，看似旁征博引，其实没有多少知识生产的意义，更不要说回击“历史修正主义”的挑战了。

1974年4月11日，罗兰·巴特和四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应邀访问中国，一行从北京飞往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经南京到洛阳和西安，最后飞回北京，于5月3日返回法国。一路上，罗兰·巴特记下了不少观感，但直到他去世多年后，这些观感才以《中国旅行笔记》为题出版。^② 翻阅这本未成型的小书，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自西徂东的作者被眼前均质性的意义/非意义符号所震撼，文中多处留下“乏味”之类的评语。在南京，寒风细雨中，罗兰·巴特一行来到东郊，对于高大的中山陵，罗兰·巴特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远眺雾霭中明孝陵冰冷的石人石兽，罗兰·巴特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巴黎的“商店”“咖啡馆”。抽去意义的符号，不过是一道苍白的风景线。

^① 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② 罗兰·巴尔特：《中国行日记》，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类的概念

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 及相关核心概念通考

——兼释“中国”与民族主义论争

方维规*

在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中,西方不少中国学专家认为,Chinese nation 属于“新生事物”,约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期。鉴于汉语“民族”一词出现较晚,有人推论直至 1895 年汉语中尚无一个贴切的对应词可以移译或传导西方的 nation 概念,甚至至今都没有这样一个词汇,也有人断言前现代中国根本不存在 Chinese nation。是否能作如是观,便是本文写作的缘起。笔者试图从中西概念的演变和对比出发,并从中西思想史及历史语义学(概念史)的角度,疏证 19 世纪中西全面接触之后,nation 在汉语中可能的表述形式。要分析和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这一西学东渐的产物,当然要对西方的 nation 概念史以及民族主义思潮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一个概念离不开与之相关的概念群,不探讨其他有关概念,是无法真正把握一个概念的。因此,本文还围绕 nation 概念,勾稽中国近代民族观念及民族主义(以及“前民族主义”)中的“国家”“国民”“人种”等一系列概念的发展和变迁,以呈现一个概念体系(概念网络)的整个表述维度及其来龙去脉。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体制形式,或不同的转型途径,对事物的认识前提必然也是不同的。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出发,演绎观察不同的存在和认识,未必能够弄清真相。因此,文章还将论及“转型”之前 Chinese nation 存在与否的问题,以及国际学界的民族主义论争所涉及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